



汉寿和平解放的经过

周光瑾

汉寿县地处湘西北，是省会长沙通向湘西北的必经之路。解放前夕，属益阳第五专员公署（辖益阳、宁乡、安化、湘乡、汉寿、沅江六县）管辖。

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和谈破裂，程潜将军发表谈话，呼吁湖南人民团结自救，保卫湖南。而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从武汉溃退来湘，企图凭借湘桂险要地势，负隅顽抗，伺机反扑。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克南京，逼武汉，势如破竹。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姜亚勋部连连出击，活跃于宁、益边界；湖南人民解放突击十二大队则由农村逼近益阳城；汉寿人民反内战、迎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汉寿县回到人民手里，指日可待，但由于反动势力嚣张，社会情况复杂，斗争仍然是相当激烈的。

一、地下党策反迎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顾星奎来汉寿，以原常益中心县委的名义，帮助重建了中共汉寿地下县委会，并研究了策反迎解工作，明确周伯诚任书记，负责争取和瓦解旧政府的工作；罗汉荣负责组织，分管工会和城区其他方面的工作；邹克廉搞宣传，负责分管农村工作。县委成员都根据各自的特点，隐蔽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分散进行活动。

第一，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汉寿人民革命斗争情绪愈加振奋，胜利信心更加坚定。中共地下县委书记周伯诚为促进汉寿和平解放，以自己组织的外围组织“大成社”（集进步人士之大成）成员为对象，开展统战工作，先后争取了国民党县党部李承明、县参议会张舜权、政界罗维松、工会文席珍、商会张介元等人，使他们靠拢人民，分化瓦解敌人。并发动教育界、工商界的进步人士出面组织工农商学各界群众读报纸，学时事，举行座谈会，宣传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鼓舞了人们迎接解放的胜利信心。为了掌握武装，打击敌人，周伯诚曾要“大成社”成员李恩普组织队伍，嘱咐他：“革命必将胜利，不过黎明之前还有一阵黑暗，希为进步事业掌握武装。”随后，李恩普即将石潭、龙津、灵岩三乡武装进行整编，组建为龙灵乡自卫中队。同时，他俩还一道去桃江找四县联防指挥部联系，李恩普当被任命为该部益汉边区副主任，率一个武装中队驻防在朱家铺灵山一带，防止敌人在这一地区的破坏。

第二，支持学生游行示威，揭露国民党镇压爱国运动的血腥罪行。中山大学学生、共青团员罗祥生，是1948年8月省团委安排回汉寿县中工作的。他来汉寿后很快与中共地下党员罗汉荣取得了联系。在罗的指示下，他和县中进步教师李华、谭仁等经常组织师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举行时事座谈会，发表演讲，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1949年四·一南京惨案、四·一三岳阳惨案发生后，他立即发动、组织汉寿中、小学师生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声援南京、岳阳的学生运动。反动派对此极端恐惧和仇视，派特务跟踪，叫嚣城内有“异党”活动，扬言“衙门坪里有鬼叫”，百般威胁、阻

挠和破坏。在这紧要时刻，罗汉荣曾多次与罗祥生秘密接触，给予指示、支持。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是无所畏惧的。罗祥生等终于在四月二十一日带领县中、简师，弘毅和辰阳镇中心小学师生一千余人，在汉寿城关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扛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自由、要民主、要生存”的巨大横幅，高呼“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口号，沿途散发传单，痛斥反革命内战的罪恶和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许多市民鸣放鞭炮，热情欢迎，许多工人、农民自动加入游行行列，跟着师生高呼口号，顿时，全城热气腾腾。

当游行队伍通过县衙门坪时，反动军警架起机枪对准示威人群。地下党组织事先安排张舜权等人邀集军警反动头目打“麻将”。当游行的口号声震动全城时，他们的牌兴正浓，张舜权等人说：“狗虱撑不起被褥，几个学生闹不成大事，别管他。”麻痹了反动派，掩护了游行队伍，使师生冲破了俗称“鬼门关”的衙门坪。“四·二一”学生运动，促进了我县人民新的觉醒，为我县的和平解放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三，组织力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档案资料。在临近解放、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为防止坏人捣乱，特别是敌人的破坏，地下县委利用罗汉荣担任工会主席的合法身分，组织工厂工人、商店店员建立护工队，以罗汉荣任大队长，轮流值班巡逻，维护社会治安，监视敌人的活动。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保护好档案资料。地下县委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曾多次研究，周密部署，探知档案室管卷员聂毓圃是大成社成员彭德昭的妹夫，周伯诚便委托彭做聂的工作，不让档案失散或烧毁，并派党员胡走剑，严密监视。另外还通过大成社安排张舜权保护自卫总队的档案，李承明保护国民党机要室的档案，何顺钦

保护辰阳镇的档案。解放时各种档案基本上未受损失。

第四，利用各种力量，争取县长迎解。当时汉寿县长唐克强，系祁阳大甸村人。他在汉寿任职期间，正值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革命节节胜利，反动派已成瓮中之鳖。这时湖南人民正酝酿和平解放，而白崇禧却企图孤注一掷，顽抗到底。六月间，他在长沙召开湖南省各县县长会议，杀气腾腾，狂叫“戡乱”，要各县长回去采用高压手段，屠杀革命群众。在此严重关头，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是起义还是顽抗，每个国民党军政人员都面临严峻的选择。唐克强既不愿顽抗，做反动派的殉葬品；也不敢起义，担受重大的风险。于是采取逃避现实的办法，呈请辞职，作为他的出路。结果辞职未获批准，他回到汉寿，面对紧张局势，思想矛盾，举棋不定，苦闷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地下县委看穿了唐克强的心事，于是通过各种渠道，动员各种力量，说服、争取唐克强靠拢人民，实现汉寿的和平解放。其中罗祥生、张琼英夫妇的争取工作对唐克强的思想转变有重大影响。唐克强对罗祥生的胆量才华深感敬佩，几次和会计室主任萧冠民谈及罗祥生的为人。萧冠民与罗祥生的爱人张琼英是老朋友。因此罗祥生夫妇首先通过萧冠民的关系与唐克强发生了接触；后来又利用县中教师陈新亭与唐在政治大学同学的关系，不断接触。在每次接触中，罗祥生夫妇大谈各地的学生运动、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长沙等地高涨的应变潮流等形势问题，有时也对汉寿的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唐克强很乐意和他们谈论这些问题，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嗣后在陈家一次饭后闲谈中，唐克强感叹时局艰难，想要辞职。罗祥生恳切地劝告他不要回避现实，要利用县长职权为人民立功，才

是最好的出路。唐克强很受启发，当即表示到时候坚决起义，并把自己控制的饷械方面的机密情况都向罗祥生夫妇交了底。从此罗祥生夫妇就为他出谋献策，分析汉寿情况，商议应变计划，使这个对汉寿和平解放举足轻重的人物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并与罗祥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直到这年6月底罗祥生夫妇被迫离开汉寿为止。

唐克强经过地下党的策反工作，坚定了和平起义的信心，做了一系列起义的准备工作，还与国民党反动上司作过一些斗争：（1）姜亚勋在湘中发动起义后，第五区专员胡维陞调集所属各县地方武装进剿，同时三令五申要调汉寿一个中队前往助剿，并拨粮接济。唐克强始终没有派一个兵，也没有给一担粮；（2）李默庵在常德成立十七绥靖区司令部后，曾要汉寿拨粮一万担，充作军饷，唐克强藉口地方困难，始终没有答应；（3）宋希濂在湘西扩充兵力，所属常德某师一个副团长来汉寿要兵要粮，气势汹汹，唐克强派人把他扣押了，电请程潜主席核示，还调集兵力向常德方向戒备。正如唐克强自己所说，如果不是解放军来得快，宋希濂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二、唐克强组织“应变”

七月，云集武汉的四野大军南下，分兵向长沙、常德挺进，踞长沙之敌白崇禧开始向湘南撤退，解放的曙光，照射湖南。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唐克强会同县参议会召开了“应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政府各科室的科长、主任，自卫总队和警察局的负责人，在城的参议员、士绅、乡镇长以及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唐克强首先说：“当前局势很紧张，共产党就要打来了，我们是打还是和，请大家拿主意。我

是外县人，汉寿的事情应由汉寿人作主，大家要打，我不敢不打；大家要和平，我不敢不和平。”会上以县参议长曾毅和省参议员彭维基为首的大多数人都主张和平解放，保全地方。曾议长说：“我说几句直话，也许招致杀身之祸，不过我是‘八十岁的恩娘吊颈，顺路一条’。汉寿这几枝破枪不能打仗，打起来只会使百姓遭殃。”他的意见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以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彭裔谦、三青团干事长王之麟为首的顽固派本来主张打，但看到和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敢公开抗拒，只好说，“和平解放我也同意，只怕不那么容易，如果条件太苛刻，我就和共产党拚到底。”讨论结果，一致同意请唐县长相机行事。唐县长没有明确表态，只对会上不同意见进行了开导，恳切地要大家以地方为重，人民为重，不要因为个人利害，搞得地方糜烂不堪。会后还亲自写了张安定秩序的布告，其中有这么两句：“地方人民为重，不许殃民以逞。”接着又指示各乡自卫队：没有县政府的命令，遇到解放军不准擅自开枪，以免引起误会，危害地方。唐克强提出的保全地方、保护人民的主张，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顽固派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

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进入常德，汉寿与长沙、益阳的电讯已经中断，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士绅豪富都纷纷下乡避难，县政府自卫队士兵戒备森严，进出县城都受到哨卡的盘问检查，沿江大堤上挖了漫长的战壕，士兵荷枪实弹地守卫在战壕内，空气非常紧张。就在这紧张时刻的前一两天，唐克强突然接到省政府批准辞职的命令，在惊疑之下，他打算立即离开汉寿，委托秘书桂葆荪代办移交。曾毅等人闻讯甚为惊骇，认为唐克强一走，县政府无主，主战派和一些野心家必然拖走军

队，各立山头，汉寿的局面将不可收拾。于是同去挽留唐克强，愿以身家性命保证他的安全。唐克强为顾全大局，毅然留下。但是当时局势极为艰难：（1）倡导和平运动的程潜主席已被迫离开长沙，代理省主席陈明仁是白崇禧的干将（当时都不了解陈明仁将军是和程主席一道主张和平起义的），残酷镇压爱国人士。（2）汉寿的反动势力很嚣张。县政府各部门反动的转业军官很多，不赞同和平起义；掌握县里主要兵力的是副总队长彭裔谦，他是县内有名的反共老手；国民党七十三军有个独立旅摆在汉寿，旅长王泽模经常在县政府进进出出；帅鹏、戴勛斋等特务气焰嚣张，到处寻找岔子。（3）举行和平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城，又与共产党没有直接联系，不知向何处接头，为此忧心忡忡，坐卧不宁。在这紧张复杂的局势下，帅子凤奉曾松老之命来见唐克强，提出“县政府和自卫总队撤出县城，脱离接触，静观时机”的意见，唐克强思想上豁然开朗，当即召开参议员和各科、室、局、队负责人会议，决定：（1）县政府成员和所有枪兵离开县城，待命行动。城内留李刚武维护秩序，防止坏人乘机捣乱；（2）由副总队长彭裔谦负责派侦探人员打听解放军的消息；（3）副议长张舜权负筹措士兵给养之责。（4）县政府清理案卷，把尚待处理的有关财务和军法上的文件一律装箱带走。无线电台带着一起走。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唐克强率县政府全体人员和全部自卫队武装撤离县城。彭裔谦、张舜权率自卫队的一部驻扎在东门外十五华里的大堤头，唐克强随带枪警一排，在北门乘汽船经岩汪湖、排子窖向石板滩方向迁移。跟随走的有主任秘书桂葆荪、军法秘书张幼闻、会计室主任肖冠民、民政科长饶宏弼、财政科长刘聚训、军事科长戴宗其、代警察局长刘雄飞。此外，

还有科员、事务员、出纳、庶务、监印、收发等数十人，沿途还张贴买卖公平和安民布告，以稳定民心。八月一日到达石板滩，驻扎在一小学内，听候解放军进城的消息。这时，城内机关都已撤走，街上行人寥寥，县城处于真空状态，解放军可以毫无阻挡的进城。

三、汉寿县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是汉寿县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汉寿人民在经历了长期黑暗统治后，迎来了人民子弟兵，获得了和平解放，开始走上和平幸福的金光大道。

是年七月底，四野部队进入常德。我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当时形势，明确任务，具体分工，派组织委员罗汉荣和烟业工人李文玉于八月二日赴常德迎接解放军，汇报汉寿的时局。四日下午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派部队开进汉寿城，五日，于博团长召开民商会议，指定省参议员彭维基在唐县长未回县之际主持县政；指派李刚武为收编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日内将自卫队、警察局、镇公所的枪支弹药全部集中保管。会后，彭维基便“高吹归队号，同唱扭秧歌”，以工、商界为主组织欢迎队伍，做好欢迎解放军和恢复城区秩序的工作。（1）保证驻城解放军粮食菜蔬的供应，动员商贩接受、使用人民币。（2）通街鸣锣，通告商户开门营业。（3）分工写标语，制彩旗，准备锣鼓、鞭炮欢迎解放军。刹时间，城内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到处贴满了欢迎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拥挤着川流不息的看热闹的人群，沉寂的汉寿城又沸腾起来了。六日，彭维基写信催促各机关负责人和绅士等迅即

回城；曾毅派专人送信给唐克强，告诉他：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晚上都不肯进屋，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并说明部队首长很客气，希他立即回城协商工作。这时程潜主席和陈明仁将军和平起义的通电也传到了汉寿，唐克强便召集彭裔谦、刘雄飞和各科室负责人会议，决定和平起义，解除武装，把枪支集中起来，派人一捆一捆的交给进城部队。八月八日，彭维基奉部队首长之命，召集工、商、学、兵、妇女各界联合会，成立“汉寿县治安供应各界联合办事处”，设委员十五人，彭维基为主任，唐县长、张副议长为副主任。黄昏时，主任秘书桂葆荪偕同主任会计肖冠民、付总队长彭裔谦、代警察局长刘雄飞和科长戴宗其、军法秘书张幼闻等进城会见于博团长，代表唐克强宣布和平起义，并在起义协议书上签了字。八月十日，唐克强回县，由部队首长于博团长安排他主政，协助筹粮支前。八月十二日，收编委员会和解放军王同志赴仓库验收自卫队、警察局全部枪支弹药。就这样，未放一枪一弹，汉寿和平解放了。

八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在城关设立“汉寿县城防司令部”（司令员郭介文，副司令员雷行）和军政联合办事处。八月十九日，随军南下、益阳专署分配来汉寿的工作人员九十八人，由县委书记梁向明带领到达县城，组织部长王之林接收了地下党组织名单，地下党成员与南下同志胜利会师，协助县委作好安定秩序、搞好宣传和接管工作。二十九日，奉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以刘亚南为县长，正式成立汉寿县人民政府。三十日，发布了行字第一号《布告》，重申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安定社会秩序，号召全县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八月三十一日，刘亚南县长召开了旧职员一百二十余人大会，殷

切希望他们着眼向前，不要轻信谣言，一面办好移交，一面开展新的工作。会后，刘亚南县长将唐克强和他的秘书桂葆荪等人安排在前县党部的房子里专办移交。各科室主任、科长、对口办理有关文卷、财物的移交。

九月三日下午，体育场三千余人大集会，热烈庆祝县人民政府的成立，会场上红旗招展，万众欢腾，为我县从来未有之盛况。会后由城防司令部宣传队演出《蒋介石的末路》、《兄妹开荒》等歌剧。从此，汉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开了新的革命和建设步伐。旧政府人员在九月底移交清楚之后，唐克强送益阳专署学习，其余起义人员，县人民政府分别不同情况作了安排，开始了各自新的生活。

顺应历史潮流 保全人民利益

——回忆汉寿和平解放

唐克强

我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到汉寿任县长的。为顺应历史潮流，保全人民利益，我赞成程潜主席的和平运动，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汉寿终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和平解放了。就我个人来说，早在一九四八年冬就看出了国民党必然垮台。我不愿替国民党反动派作殉葬品，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曾不断请求辞职，特别是白崇禧在长沙召开湖南各县县长、参议长、书记长会议以后，我的辞职更加坚决了。这次大会大约是五、六月间召开的，白崇禧和他的喽罗田良骥（当时的民政厅长）等在会上讲话，杀气腾腾，要各县县长回去用残酷的屠杀手段去镇压一切革命运动。会后我再也不想回汉寿去了，亲自向田良骥再三请求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后来又请当时的教育厅长、我的同乡李祖荫（祁阳人）代向民政厅长和程主席请求准予辞职，也没有请准。据说还是要我去，去了以后再说。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再回汉寿。当时湖南的情形很复杂，以白崇禧为首的反动集团是企图顽抗的，以程潜为首的一派是主张和平解放的（虽未明言，但从他的言语和行动上已隐约可以看出）。我在回汉寿前曾向程潜主席请示机宜，他对我说：“常德、汉寿不会有战事，回去好好安定地方。”我得到这个指示，心中大体上有了底。回到汉寿后，看到汉寿的情况不稳，有些在乡

的反动军官如黄鑫等准备把县里和各乡镇的枪枝拖到湘西去打游击，常德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还发了“派令”给他们，规定“带枪越多官越大”。我了解这些情况后，马上找有关人员黄翼、王之麟（国民党县党部副书记长、原三青团干事长）等恳切进行开导，要他们以地方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要贪图个人升官发财，搞得地方糜烂不堪。同时，我还亲自起草了一张安定秩序的布告，记得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地方人民为重，不许殃民以逞。”当时，我在汉寿还有相当的威信，经过反复开导和张贴布告，全县的秩序又安定下来了。

临近解放前十来天，忽然接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代主席陈明仁准我辞职的电报，我很高兴。因为我当时以为陈明仁是白崇禧带来的，他在长沙当警备司令时曾讲过这样的话：“不惜把长沙变成‘四平街第二’。”陈可能跟白一样顽抗到底，而程潜主席当时已被迫离开了长沙，我与共产党和解放军又没有直接联系，既不愿顽抗，又不知向何处接头起义。因此得到辞职电报后，准备让秘书代办移交，自己马上晋省。但是县议会和其他人士恳切请求我留县，等待解放后再走，他们的理由是：我一走，地方就会乱，在乡的反动军官马上就会拖枪出县，局面将不可收拾，所以他们不让我走，甚至说要用自己的生命保证我的安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很受感动，不得不以地方人民利益为重，个人的安危只好置之度外了。为了安定地方，使人民少受一点灾难，在汉寿和平解放之前，我与当时反动的上级还作过一些斗争。如姜业勋在湘中发动起义，第五区专员胡维陞调集所属益阳、宁乡、沅江等地方武装进行“围剿”，同时也三令五申要汉寿（当时属第五区）派一个中队前往助剿，并拨粮救济，我始终没有派一个兵，也没有给一粒

粮。李默庵在常德成立十七绥靖区司令部，要汉寿拨粮万担以上，我以地方困难为由，始终没有答应，事后特务帅 鹏 对我说：“李司令官认为你有共党嫌疑。”我回敬他说：“我反正不想干了，什么嫌疑不嫌疑，撤我的职好了。”宋希濂在湖南扩充兵力，所属常德某师一个副团长来汉寿要兵要粮，气势汹汹，我把他扣押了，并电请程潜主席指示。后接程主席回电，要我转商宋司令官。我知道，如果打电话给他，那是自讨没趣，我也就不了了之，把那个副团长训诫一番释放了。为了这事，我曾调集汉寿自卫队向常德戒备。如果不是解放军来得快，常德某师会对我进行报复的，宋希濂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当解放军从监利渡江进入湘北后，我曾一再下令如有解放军入境，不得开枪。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保全地方。如果打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到头来还是百姓受苦，地方遭殃。当解放军快进入县境时，我的内心是很紧张的。因为没有同解放军直接接过头，程主席又被迫离开了长沙，而长沙、益阳等地音讯不通，情况不明，局势很紧急。在此情况下，与县参议会及各公法团体会商，结果要我带领县政府人员及全部武装离开县城，暂驻乡下，以免和解放军进城发生冲突；我也想向益阳方向靠拢，取得联系。因此，在七月三十一日，我把县政府及警察局等机关迁往石板滩，自卫总队由副总队长彭裔谦率领驻扎在 陈军堤附近非湖港要道的大堤头等待命令。在我离开县城之前，留下了城区警察派出所的枪警一班，维持秩序，并再三叮嘱，解放军来时不能开枪。直到这时，我没有明白说出我要起义，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说，因为：县政府各部门反动的转业军官很多，他们是不可靠的；掌握县里主

要兵力的是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彭裔谦，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县内有名的反共人物；况且国民党七十三军有个独立旅摆在汉寿，旅长王泽模经常在县府进进出出；特别是特务帅鹏、戴勛斋等时常在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寻找机会下手。基于上述情况，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我如果说要起义的活，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我要县、乡自卫队和城区警察派出所不开枪的唯一理由，就是以地方人民为重，要抵抗也抵抗不了，徒然糜烂地方，给人民带来灾难，大家都很信服我的这点理由，所以汉寿风平浪静，没有放过一枪一弹。我们到石板滩后，经常派人到县城了解情况，探听解放军进城的消息，并设法与益阳专署及湖南省政府取得联系。后来县参议长曾毅来信说：“解放军进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晚上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不肯进老百姓的家。同时说明解放军指挥员对我的印象很好，欢迎我赶快回县。正在这时，我们得到了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和平起义的通电，我非常高兴，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响应和平起义。在会议中，少数反动军人仍有些犹豫，但在形势逼迫下，经过说服教育，都没有异议，一致同意和平起义。副总队长彭裔谦、代警察局长刘雄飞及各科室负责人在主任秘书桂葆荪的带领下，于八日八日回县向解放军报到投诚，并点交了全部人员和枪枝弹药。当时我没有同其回县，因为我原来想，我已是辞职照准的卸任县长，把县印一交，托秘书办理移交，我的任务即已完成，想就近去益阳、长沙向程主席汇报。后来解放军首长一定要我回县，于是我遵命再回汉寿，亲自指导各科室学习和办理移交，顺利完成了汉寿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题目是编者加的。原文存汉寿县档案馆）

汉寿和平解放的回忆

张幼闻

1948年冬，我寓居长沙候差，在又一村宾馆碰到中学时代的同乡好友唐克强，互叙离情，他说：他自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县长，分到总统府工作；程潜竞选副总统时，他与湖南在京人士为程“抬过轿子”；淮海战役后，南京震动，知道程潜将回湘主政，便活动回湖南，现任汉寿县长。程现在提倡“和平运动”，倡导停止内战，停止征兵、征粮，清理田粮员司亏欠，制裁转业军官闹事，看来局势在大变动，前途莫测，邀请我助他一臂之力，到汉寿开创一个新局面，将来也许是条出路。我即答应他的要求，于1949年春节过后即去汉寿，担任军法秘书。

我和主任秘书桂葆荪都是唐克强的同乡旧友，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县政大事都事先商量策划然后实施，我们确定了几条基本原则：（一）、我们是外地人，汉寿派系多，明争暗斗，争夺激烈，我们不偏向任何一派，只制衡利用。当时正义社（以饶宏弼、肖富强、高云鹏等为首）、大成社（又名十人团，以周伯诚、张舜权、罗汉荣、李恩普等为首）两派势力较大，便顺势多安排一些位置，但也不冷落其他派系。（二）、牢固掌握枪杆子。当时县里的枪杆子大部分掌握在自卫总队副队长彭裔谦手里，首先便要控制住彭，决定由桂葆荪与他建

立私人友谊，唐克强在政治上多给他一些甜头。（三）、不迫害进步人士，不镇压革命群众，不在地方上结怨。（四）、只听程潜的命令，照程定下的大政方针办事，抵制其他势力的干扰。当时我们最迫切的希望是能够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直接联系，可是没有门路。眼看解放军打过长江，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唐克强多次去长沙晋见程潜，想讨个信，程不表态，只含糊其辞地说：“到时候会给你指示的。”唐克强回到县里，按我们商定的原则办了以下这些事：

（1）屯垦军官强伐堤树，敲诈民财，引起群众强烈反对。唐克强下令逮捕了为首的军官三人，一百多屯垦军官聚众包围军法秘书张幼闻（好象是在东湖酒楼）叫嚣打闹，强迫释放被捕的三人；唐克强立即调一个警察中队去弹压。

（2）雷厉风行追查员司亏欠，关押十余人，连与地方势力关系复杂的毛疆夫也不例外。

（3）县自卫总队驻防百禄桥的一个班长被杀害，彭裔谦派人抓了六个嫌疑犯，苦打成招，准备枪毙；唐克强要我把案卷从自卫总队部调到县政府军法秘书室，从新慎重处理，我以证据不足、案情有出入为由，全部交保释放。

（4）沧港饥民聚众抢公粮，抓到送县审理的有五人；唐克强与我商量，认为贫苦百姓为饥饿所迫，出于不得已；结果游街后释放了。

（5）1949年4月21日，县中、简师等校的学生上街示威，唐克强和我事先就有所闻，商定对策是：只要不冲击政府，抢夺枪文，就听之任之。

（6）姜亚勋在宁乡发动起义后，第五区专员胡维陞要抽调汉寿一个自卫中队前往助剿，并应允拨发粮饷，唐克强以

地方不靖，兵力单薄为由，婉予拒绝。

（7）、李默庵的十七绥署要汉寿拨粮一万担以供军需，唐克强以汉寿是灾区，民不聊生，始终不答应。

（8）、宋希濂在湘西扩充兵力，派一个副团长来汉寿要兵要粮，其势汹汹，纠缠不清，唐克强便把他扣押起来，并电请程潜核示，还调集兵力对宋部戒备。

到1949年6月间，白崇禧由武汉撤退到长沙，由其手下干将、新任湖南省民政厅长田良骥主持召开专员、县长会议，要求各县长回去以后恢复征兵征粮，支援前线，镇压动乱，安定地方。会后，唐克强便提出辞职，未获批准。他向程潜请示，程潜劝他回汉寿，并说：“你照旧干好了，益阳地区不会有战争的。”唐克强回到汉寿，时局更加混乱，李默庵的绥署在汉寿设立“戡建大队”，建立情报网，搜罗旧军官，招兵买马，如黄翼自封为团长，企图组织武装。国民党七十三军的旅长王泽模和政治部主任（汉寿人，忘其名），也想拉汉寿的地方武装，扩充实力。县内各派力量都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拚命奔走呼号。汉寿籍的省参议员彭维基，由长沙回到汉寿，倡议和平解放；彭裔谦一伙则主张“拼”，拼不赢就到湖区打游击。到七月间，眼看解放军分兵进攻湖南，唐克强与我和桂葆荪研究应付时局的办法，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首先把各界各派的认识统一起来，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共渡难关。唐克强便出面与各方头面人物交换意见，大家赞成设立“应变委员会”主持大计。于是在县参议会召开“应变”会议，参加的人有：省参议员彭维基、县参议长曾毅、在城的参议员和士绅、公法团体负责人、县政府科室主管人、各乡镇长、自卫总队和警察局的官佐等，共百数十人。唐克强开宗明义的说：“现在局势紧迫，共